

古典文獻新視野叢書



經緯成文

漢代經學的思想與制度

徐興無著

古典文獻新視野叢書



經緯成文——漢代經學的思想與制度

徐興無 著

鳳凰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經緯成文：漢代經學的思想與制度 / 徐興無著. —
南京 : 鳳凰出版社, 2015.12
(古典文獻新視野叢書 / 程章燦主編)
ISBN 978-7-5506-2298-2

I. ①經… II. ①徐… III. ①經學—研究—中國—漢代 IV. ①Z126.273.4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5)第296083號

書名	經緯成文——漢代經學的思想與制度
著者	徐興無
責任編輯	林日波
出版發行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發行部電話025-83223462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號,郵編:210009
出版社網址	http://www.fhcbs.com
經銷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排	江蘇鳳凰製版有限公司
印刷	江蘇省句容市排印廠 句容市春城鎮南,郵編:212404
開本	652×960毫米 1/16
印張	26.25
字數	329千字
版次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506-2298-2
定價	95.00圓

(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電話:0511-87871135)

江蘇高校優勢學科建設工程資助項目

江蘇省“中國文學與東亞文明”2011協同創新中心資助項目

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五經總義類文獻

與經學史研究”（12BZX047）階段性成果

古典文獻新視野叢書

總序

程章燦

古典文獻是傳統文化的載體，研究傳統文化，不能不從古典文獻整理與研究的基礎工作做起。另一方面，對古典文獻進行整理、闡釋與研究，不僅是傳統文化研究的重要內容，同時也是繼往開來、建設二十一世紀中國學術文化的重要一環。衆所周知，中國歷史悠久，古典文獻汗牛充棟，擺在研究者面前的任務是相當繁重的；而如何通過對古典文獻的整理與研究，表達當代人的學術趣味和文化關懷，體現當代人的學術眼光和學術水準，我們所面臨的挑戰也是相當艱巨的。這是一項偉大而繁複的事業，可以分解成無數項具體的工作，需要很多同仁的投入與協作；同時也是一項細水長流的事業，每一位傳統文化研究者都責無旁貸，儘管各人所能貢獻的也許祇是涓滴之水。實際上，如果打一個比方，文獻傳承就好比一條河流，那個表面上似乎看不見摸不着的文化傳統，正如粼粼波光，蕩漾於寬闊的河面之上。這條河流蜿蜒曲折，在流淌過程中不斷接納來自山澗的溪流，吸收來自天上的雨水，也慷慨地奉獻，灌溉着其所流經的廣袤的中華大地。今天，這條河已經流到我們面前，我們怎麼能不對它有所貢獻呢？

有鑑於此，二〇〇八年，南京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同仁在中華書局出版了一套“文獻傳承與文化認同研究”叢書。在那一套叢書的總序中，我曾經強調文獻傳承對於傳統延續、文化建設以及文

化認同的形成的重要性。我在序言的最後，表達了這樣一個態度：“也許我們做得不夠好，但是，我們一直在努力。”現在呈現在各位面前的這一套“古典文獻新視野”叢書，就是我們繼續努力的表現。前一套叢書的標目，強調文獻傳承研究對於文化建設的現實意義，而這一套叢書的標目，則強調以新的視野來整理與研究古典文獻。從表面上看，兩套研究叢書似乎頗有不同，實質上卻是相輔相成，後先承續的。

中國古典文獻學是一門古老的傳統學科，歷代成果積累之豐厚、傳統學術方法之完善，都使人們容易產生這樣一種感覺：這樣一門學科很難再有新的領域開拓和學術創新了。從某一個角度來看，這種感覺似乎有一定道理，因為我們畢竟處於一個與前人不同的時代，我們既沒有從小接受過古人那樣的蒙學教育，也沒有像前輩大家那樣深厚的小學基礎，甚至也不可能像古人那樣皓首窮經，聚精會神，窮畢生之力專治一經。作為當代人，我們不得不分出若干精力，學習其他知識，掌握其他技能，以應付日常生活和學術研究之必需。但是，我們畢竟擁有某些古人所沒有的優勢，例如在文獻資源的占有和使用方面，我們便有着較古人方便優渥的條件。當代公私圖書館整理並開放自己的典藏，雖然並不完全理想，畢竟已經有了很大的改進；新時期以來，古籍整理研究成果的出版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這些都是古人難以想象的。至於近年來，隨着方興未艾的電子技術和無所不在的網絡技術的發展，衆多體量龐大而且以前堪稱稀見的古典文獻，紛紛化身為便携易檢的電子數據，成為幾乎隨時隨地都唾手可得的資源，這種景象非但古人無法想象，即使前推半個世紀，恐怕也沒有學者能夠想到。總之，無論是傳世文獻還是出土文獻，無論是影印出版還是整理出版，紛至沓來的文獻資源，為今天的研究者打開了一扇更開闊的窗口。文獻資源方面得天独厚的條件，也使當今研究者擁有了文獻資源的新視野。

這裏所講的文獻資源，實際上已包含前人在古典文獻整理研究

方面所取得的成果。這些學術積累不僅是我們整理研究和消化吸收的物件，而且也為我們的研究奠定了學術的基礎，使我們可能擁有更開闊的視野。套用那句老話來說，即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就有可能比古人站得更高，看得更遠。我們不僅可以上下流連，還可以“左顧右盼”，“東張西望”，吸收國內外相鄰學科在文獻整理研究上的經驗和方法，提升研究的學術境界。掌握更全面完備的資源，輔以新的研究方法與理念，就有可能使我們的立足點更為高遠。在這樣的學術基點之上，即使處理古典文獻中的基本典籍和基本問題，也有可能採取與傳統學術不盡相同的方法，得出不同的結論，取得全新的成果。換句話說，視角的更新與多樣化，也就可能帶來視野的更新與多樣化。以往未曾受到關注、未曾受到重視的古典文獻，就有可能因此進入我們的視野，生僻可以變為熟悉，冷門可以變成熱門，伴隨着研究對象與研究主體的風雲際遇，古典文獻學術史也將展現新的景觀。

運用包括現代電子技術在內的各種研究手段，不斷開拓可供利用的文獻資源，是當代古典文獻研究者的職責。在這一方面，除了重視對傳世文獻的發掘和整理，強調對新出土文獻的整理和利用之外，還應該加大對既有文獻總體再加工的工作強度，生產出更多、更具學術價值的新學術文獻。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志在建設一座古典文獻的宏偉大廈，那麼，除了發掘並整理傳統文獻和出土文獻，使用那些現成的建築材料，還應該自己動手，設計、發明和生產更方便、更安全、更堅固耐用的建築材料。要之，古典文獻不僅是供我們整理和研究的，也是需要我們生產、積累並重構的，祇有這樣，這一資源才會日益豐富，而不至於陳舊、匱乏。

顯而易見，古典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是分不開的，輯佚學就是很好的一個例子。輯佚學中既有整理，又有研究，是一門很能體現中國古典文獻學特色的學問：利用既有的古典文獻資源，努力恢復已經佚失的古代典籍，重建古典文獻彼此之間已經失落的某些聯繫，

進行這些工作的學者，有如施展回春妙手的醫生，使亡書佚籍“無中生有”，甚或“起死回生”。在研究的基礎之上進行整理，根據重新建構的新文献，展開新一輪的研究，學術疆域便可能如漣漪般向外擴展。在這裏，我們不僅可以看到，中國古典文獻是一個縱橫雙向開放、不斷變化、日益豐富的系統，而且應該看到，中國古典文獻還是一個環環相生、彼此聯繫的系統。乾嘉學人熱衷於輯佚之學者不乏其人，其旨趣絕不止於個別典籍，而是更着眼於其背後的那個宏大的古典文獻系統，志存高遠。在現當代學術界頗為流行的各種輯編彙纂，在某種意義上，就可以說是從輯佚學中發展起來的，雖然二者的方法與結果有所不同，但是在“無中生有”的思路上，卻堪稱殊途同歸。當然，這些輯佚或者輯編彙纂涉及諸多學科，規模不同，大小各異，類型繁多，形式多樣，其方法亦因研究對象的不同而作相應調適。至於其對象的選擇，則往往取決於學者的立場與旨趣。在這裏，新視野主要體現在整理和研究的方式上，這種方式不僅體現了現代學術的旨趣，也在方法和視角上體現了現代學術方法的進步。

上文主要是就資源、視角、方法和動機這幾個方面而言，嚴格說來，古典文獻研究的新視野，絕不祇限於這些。這一套叢書中所包含的諸書，各有側重，各有特色，將會證明這一點。就像它的研究對象一樣，我們希望，這一套叢書也能成為一個開放的系統，祇有更多的人、更多的研究成果參預進來，古典文獻及其研究才能與古為新，生機勃勃。

是為序。

自序

集中收入我十多年來的論文十二篇，內容涉及兩個方面，一是先秦至兩漢經學文獻的思想史考察；二是漢代經學的學術制度考察。

漢代是中國古代經學確立與昌明的時代，漢代經學的文獻面貌和其他時代最大的區別，在於由“經”與“緯”兩種文獻組成，尤以漢儒的經說與讖緯文獻最具漢代思想的特徵。漢儒的經說不僅體現在傳記章句注箋之中，還存在於讖緯、漢魏諸子以及史籍之中；讖緯文獻被後世書目附着於經學，由於學術與政治的揚棄，自宋以後多被歸入五行術數且散亡不全，遂成輯佚考古之學。上述諸多文獻史料之間形成了一種“疏證”的關係，因此，研究兩漢經學思想，應對“五經七緯”等文獻做出全面考察，特別是要在殘佚的讖緯文獻中復原漢代獨特的經學思想和知識體系。比如，漢代經學實現了對先秦諸子的綜合，又以“究天人之際”為學術目標，因此對身體與自然的問題多有獨到的闡發，這是我的研究比較關注的現象之一。

和先秦諸子時代不同的是，兩漢經學的思想學術往往不是由個體思想家或學派獨自創發、解釋和建構的，其文獻體系、師承傳統和兩漢的政教制度決定了漢代經學的學術組織和思想生產方式。自清代以來，今、古文經學之爭、師法家法之辨一直是討論不休的問題，但一些事實並未得到釐清，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我們往往囿於經學史或哲學史的學術意識形態，沒有進一步比勘和解讀常見的漢代史料與經學、讖緯文獻；沒有從兩漢歷史文化的具體現象入手，以至於自王國維、錢穆等學者提出的一些基本問題並未得到進一步的論證和回應。

1990 年，我在周勛初師和莫礪鋒師的指導下攻讀博士學位，開始研究讖緯文獻，在《中國社會科學》、《中國古籍研究》、《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等學術刊物上刊發了數篇論文。畢業後留校任教，主持並完成了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 1996 年度青年項目“讖緯文獻與戰國秦漢間以儒學為主的文化構建”，試圖在先秦兩漢經學和歷史文化的背景中考察讖緯文獻中的思想體系及其對漢代文化的意義，這些成果集結為《讖緯文獻與漢代文化構建》一書，於 2003 年由中華書局出版。

2000 年以來，我受勛初師之命，撰寫匡亞明先生主編“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中的《劉向評傳(附劉歆)》，進一步涉及漢代經學與學術制度的研究；此後又主持並完成了教育部 2002 年度留學歸國人員科研基金項目“漢唐儒學研究”、教育部 2003 年度“優秀青年教師資助計劃”項目“漢唐通儒研究”；近年來又主持了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 2012 年度一般項目“《五經總義》類文獻與經學史研究”。在此過程中，我對經學文獻的形成、讖緯文獻中知識與觀念的形成、漢代解經過程中的思想方法、漢代經學會議與爭論、經學通義類文獻的學術範式等問題做了些個案研究，發表了上述成果。這些成果中，除了《議郎與漢代經學》在 2011 年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舉辦的“秦漢經學國際研討會”上宣讀而未刊行之外，其他均在已刊論文的基礎上加以修訂。依時間次序為：

《石渠閣會議與漢代經學的變局》刊《古典文獻研究》第六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

《道德、政治、醫術——讖緯文獻中的儒家治氣養性之術》刊《中華文史論叢》第八十七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論說與叙事——從〈左傳〉看儒家的史學傳統和話語形式》刊《周勛初先生八十華誕紀念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

《“王者之迹”與“天地之心”——漢代〈詩經〉學中的兩種文化闡

釋傾向》刊《文學評論叢刊》第11卷第1期(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

《作為匹夫的“玄聖素王”——讖緯文獻中的孔子形象與思想》刊《東亞論語學》(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

《漢代人性論中的“魂”、“魄”觀念》刊《南京大學學報》2010年第2期

《經典闡發與政治術數——〈洪範五行傳〉考論》刊《古典文獻研究》第十五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

《東漢古學與許慎〈五經異義〉》刊《中國經學》第九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五嶽與三公——經學與漢代的山嶽祭祀》刊《綠色啓動:重探自然與人文的關係》(臺北,臺灣“中央大學”出版中心,2012)

《異表:讖緯與漢代的孔子形象建構》刊《東亞視域中孔子的形象與思想》(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

《論趙岐〈孟子章句〉》一文寫於博士學習期間,蒙勛初師和礪鋒師審閱提携,刊於《古典文獻研究(1989—1990)》(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由於涉及漢代經學思想的討論,故一併收入本集。

由於我生性疏懶,學不精進,加之長期滄陷於學術行政工作,如果沒有師長同仁的幫助及其成就的鞭策,這些學術習作也很難完成。我要特別感謝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文學院、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臺灣“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國際《尚書學》學會、清華大學歷史系經學研究中心等單位,這些論文中的大多數都是在他們舉辦的經學或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的;感謝黃俊傑、林慶彰、陳鴻森、葉國良、蔣秋華、陳昭瑛、林啓屏、蔡振豐、張昆鏘、鄭吉雄、彭林、錢宗武等老師和朋友們的邀請與評審。我還要感謝我的學生們,他們的討論給了我很多補益和幫助,甚至糾正了我在相關知識上的錯誤。此外,我還要感謝上述論文和本書的編

輯們，他們指出了許多材料與表述上的問題。

這些論文刊發之後，我仍然覺得尚有修改或補充之處，所以收入本集時，又對各篇做了修訂，個別篇名也有改動，對引文的版本和體例稍加統飭。唯各篇寫作時間跨度較大，刊物的要求不一，為方便閱讀計，今悉作頁下注，不再列出全書的引用書目。

《左氏》云“經緯天地曰文”；征南注曰“經緯相錯，故織成文”，今斷章取義，以為書名。

徐興無

2015年3月於啓園

目 錄

古典文獻新視野叢書總序	程章燦(1)	
自序	(1)	
思想編		
論說與叙事		
——從《左傳》看儒家史學傳統的形成	(3)	
“王者之迹”與“天地之心”		
——漢代《詩經》學中的兩種文化闡釋傾向	(37)	
經典闡發與政治術數		
——《洪範五行傳》考論	(68)	
道德、政治、醫術		
——讖緯文獻中的儒家治氣養性之術	(104)	
漢代人性論中的“魂”、“魄”觀念		(150)
五嶽與三公		
——漢代經學與山嶽祭祀	(183)	

作為匹夫的“玄聖素王”

- 識緯文獻中的孔子形象與思想 (217)
- 異表：識緯與漢代的孔子形象建構 (248)
- 論趙岐《孟子章句》 (281)

制 度 編

- 石渠閣會議與漢代經學的變局 (307)
- 東漢古學與許慎《五經異義》 (331)
- 議郎與漢代經學 (368)

思

想

編

論說與叙事

——從《左傳》看儒家史學傳統的形成

一 魯君子與魯太史

本文的討論基於一個大多數學人的共識，即《左傳》是一部比較可靠的記敘、論說春秋史事的史書，而不是劉歆等人偽造的典籍；其書寫的目的旨在解說魯國的史記《春秋》，或是解說孔子根據魯《春秋》修訂甚至創作的《春秋》。當然也不排除起始即自為一書，與釋《春秋》之事並無關聯。其成書的時代大概可以框定在春秋末至戰國中期亦或更晚。左氏、左丘明或是《左傳》的作者，或是一個值得托名的重要人物。但這個共識只是一個界定，其中沒有清晰的事實，於是學者們仍在不斷地對其文本及相關史料進行分析、考據，試圖還原其真實的情形並作出所謂實證的論斷。但是迄今為止，如果沒有確鑿的考古證據出現，單靠文獻學與考據學的方法恐怕無法達到這一目標^①。那麼，僅僅是因為上古茫昧、史料缺乏使我們無法確

^① 比如沈玉成、劉寧《春秋左傳學史稿》就認為：“清代和現代學者關於左丘明其人的討論，持論更細而不出唐、宋人的範圍。”又認為：“探討的結果如果缺乏足以否定原始記載的確切證據……或者是對懷疑者的持論可以提出同樣充分的不同意見，那麼對文獻的原始記載就應該採取慎重態度，維持成說或至少保留成說。”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頁398—399。